

翻譯與政治：唐才常的西學知識與政治思想

陳善偉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前言

一向以來，研究唐才常(1867-1900)的學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才常與自立軍起義方面，¹很少談到他在思想上由注重中學而轉移到認識西學，及把西學應用在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問題。

其實把才常一生的活動加以分析，不難發覺他對近代歷史的貢獻很大部分是與文字工作有關。他在《湘學新報》中介紹中外歷史、交涉、格致，在《湘報》推動湖南新政的實施，在《亞東時報》討論戊戌政變後的政局，都對當時知識分子產生很大的影響。本文擬對才常在甲午前後思想上的改變作一分析，以探討像才常那樣對西方語言一無所知，對西方文化亦無第一手了解的晚清士人發覺自己所學的傳統中學無法應付政局的時候，是透過甚麼途徑去汲取西學，然後把西學運用在政治理論方面。

¹ 參閱蔡少卿：〈略論自立軍起義的性質〉，《光明日報》，1984年1月4日；陳達凱：〈改良派左翼與自立軍起義〉，《江淮論壇》1988年第2期；鄧潭洲：〈關於唐才常領導自立軍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64年第11期；胡珠生：〈自立會歷史新探〉，《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嘉弘：〈自立會唐才常等與會黨的關係〉，《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李守孔：〈唐才常與自立軍〉，載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64年)，第6冊；皮明庥：〈自立軍在湖北起事始末〉，《黃石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湯志鈞：〈戊戌政變後的唐才常和自立軍〉，《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汪叔子：〈關於自立軍漢口失敗的教訓〉，《江西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薛國中：〈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敗的原因〉，《理論戰線》1960年第5期；張珊：〈論大通自立軍起義——兼論自立軍起義的性質問題〉，《安徽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鄭雲山：〈論唐才常——兼論自立軍起義的性質〉，《華東師大學報》1981年第6期。

二、「中學」時期的唐才常

如果將才常三十四歲的一生以學術取向作個分段，那麼前二十八個年頭是屬於注重「中學」的時期，後六個年頭則屬於「西學」時期。才常1867年生於湖南，父親賢疇及家人都希望他在長大後能夠經過傳統考試制度出人頭地，而他亦一直朝著這個目的而努力，望有所成。在家庭刻意栽培下，才常六、七歲已能作詩作文，十二歲已通諸經，² 所以當二十歲的才常在1886年初試童子試之時，他以縣、府、道三試冠軍入評。這個俗稱為小三元及第的成就，瀏陽在清代二百餘年中，以才常為第一人。

在其後的四年，才常一方面在嶽麓書院肄業，兼在校經書院附課，一方面在瀏陽劉春臺家中坐館教讀，幫補家用。二十五歲完成課程後，才常應四川學政瞿鴻禨之聘，於1891年冬經歷兩個多月、一千三百多里的旅程到達成都任閱卷之職，兼教讀兩學徒。從才常由成都寄回湖南的家書中，可見他一直祇對中學有興趣，並購得很多「湘中所無之書」。例如1892年6月2日上父函云：

男初次出外，一切衣服，太不雅觀，目下加製及添購書籍，已不下數十金。但目下所購書籍，多係說經之作，其成都《四史》及南北、遼、金、五代等史，俟手中寬綽時，再行購辦。男嗜書若命，故購之不惜重價，況川中書籍，多湖南所無，裝訂亦甚精緻，不趁此時購置，更待何時？³

次年2月24日上父書亦云：「蓋寒士無力置書，誠為恨事，今已購就家中所無書十數種。」⁴ 才常在成都任職至1893年5月，即返回瀏陽參加在湖南舉行的恩科試。其試卷雖有「淹貫百家，折衷一是」的好評，但終告落選。次年春，才常與譚嗣同商議後，決定往湖北謀館，當時譚父繼洵任湖北巡撫。才常後來順利考入兩湖書院，而當時同邑劉善涵亦肄業於此，唐、譚、劉由於意氣相投，過從頻密，時常探討學術，談論時政，對才常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兩湖書院授課內容來看，才常所習屬於中學範圍。據張之洞所記，書院分為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門。⁵ 而從才常在書院應課文字來看，所討論的題目雖然間中亦「講中外之學」，但大部分仍然屬於傳統學問範疇。茲將其現存課卷十二篇之篇目列出如下：（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說〉；（二）〈孝經為六藝總會說〉；（三）〈金華殿說論語賦〉；（四）〈歷代商政與歐洲各國同異考〉；（五）〈錢弊興革議〉；（六）〈問：古人用粟帛，後代用錢，近日又用銀錢，前人論其利弊詳矣，惟一旦盡改用銀錢，則收回舊銀，改鑄新錢，必如何抵換，始公私兩便，至從前用銀之款，悉改用銀

² 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7。

³ 同上注，頁23。

⁴ 同上注，頁44。

⁵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3年）。

錢，必如何立法，始易通流。又西人紙錢，即中國鈔幣，必如何定制，始能無弊，試綜論之；（七）〈徵兵養兵利弊說〉；（八）〈唐租庸調法得失考〉；（九）〈漢書藝文志群經次第與史記儒林傳不同考〉；（十）〈閒傳釋例〉；（十一）〈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子封地當今何地考〉；（十二）〈問：吐蕃、回紇不得志於唐，而契丹、女真、蒙古皆得志於宋，能言其故歟？〉。

由以上課卷題目看來，討論重點仍在於傳統之學。〈古〉文討論當時士林學術衰、人才偽、風氣不振的現象。〈孝〉文將六藝與《孝經》脗合之處加以闡釋，主旨在論說聖人之學，精微廣大，無所不該。〈金〉文則指張禹之說《論語》於金華殿，並非在於敷陳儒家大義，斥王莽之僭竊，遇不變若罔聞，有必要加以口誅筆伐。〈歷〉文謂中西強弱之別繫乎商政，中國應效法西方，士商聯為一氣，則富國有期。〈錢〉文及〈問〉文歷述中外古今以銀為錢之概況以說明中國必須用銀錢的道理。〈徵〉文謂要使士、工、商、農人人知兵事，則可以稱霸天下。〈唐〉文認為租庸調法由於戶口之數難以周知，應效歐洲每歲將人數達於戶部的做法。〈漢〉文比較《漢書·藝文志》與《史記·儒林列傳》群經次第之不同。〈問〉文則比較唐宋處理外夷的方法，認為必須建藩鎮以拱衛京師。

才常在兩湖書院應課文字成績非常優異，「居第一者已五次」，不但引起書院的注意，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亦欲召才常往見。從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這些資料並不豐富，亦是課業之作，但亦可以顯示出才常在兩湖書院肄業期間，討論問題的基礎仍以傳統學問為主，祇在〈錢弊興革議〉一文中提到美國浸禮會牧師金楷理(Carl T. Kreyer)所譯的《西國近事彙編》。⁶ 把才常這段期間稱為「中學」時期大致上可以概括其文化取向。

三、「西學」時期的唐才常

中日甲午戰爭在1894年8月1日爆發，在1895年4月17日結束，中國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場戰爭對於當時知識分子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政治上要求改進，在學術上轉向西方。才常在思想上、文化上的轉變正好反映了當時志士仁人的心態。

其實早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處境困難，才常與嗣同在兩湖書院對湖南士大夫之守舊極其痛恨，「謀所以變通之、激勵之。恒兩人對坐，徹夜不寐，熱血盈腔，苦無藉手，泣數行下」。⁷ 次年二月四日，遼陽戰事吃緊，才常在上書父中，即表示了對個人前途的悲觀及中學(時文)的失望：「男至此富貴利達，均已灰心，祇求在外間混去一兩歲，每年能敷衍了事，即是大幸。……男靜觀天下之變，時文一道，將來必成廢

⁶ 《唐才常年譜長編》，頁129。

⁷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58。

物。」⁸ 在致弟書中，才常亦云：「當今之世，經解、詞章、八股，皆成贅疣；且大亂將起，更從何處求功名富貴？」及至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才常更加感慨萬分，在5月31日上父書云：「和議已成，所約條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賣國，古今所無。」⁹ 在國難當前的情況下，才常開始尋求以西學救國之方。

西學救國之道，才常認為應該從算學始。他在〈致譚嗣榮書〉對此有所闡釋：

算學一道，為製造、測量、用兵、勦亂之源，中國太不考究，致為西人獨擅之巧。今宜力籌經費，開一算學堂，多購西人測算、鎗炮、輿圖等書及洋鎗等物，朝夕演習其中，使讀書人皆知武備諸事，又可恃以禦賊。則人才之奮興，亦即在此；較之歲費千百金，課一毫無用處之八股、經解、詞章，奚啻倍蓰？

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持一種所謂西學中源的觀念，以打破文化隔膜，以減低對西方知識的拒抗。才常亦不例外，在推許西方算學之餘，不忘說明孔孟重視算學之傳統：

夫欲知天文地輿，則算學一道，誠不可忽矣。自古聖賢未有不精於算學者。孔子之精，無待言矣。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孟子之精於算學也。周、程諸子，精於易數，亦知算學之大旨者也。蓋算學者，即格物致知之道也。¹⁰

但要推行算學，認識西學，需要有途徑。才常在具稟湖北巡撫譚繼洵於瀏陽建立格致書院時，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籌二三日金，購齊上海格致書院繙譯諸書，及儀器數種，以為士人觀摩。先導之以算學，徐進以輿地、兵法、製器諸學。」可見當時上海格致書院所翻譯出來的西方著作在才常眼中是汲取西學的一個有效途徑。至於要了解才常由中學轉到西學的情況，可以在《沅湘通藝錄》（江標編）的文字（1897），及發表在《湘學新報》（1897）及《湘報》（1898）的文章中見其端倪。

1. 《沅湘通藝錄》中所見的西學

江標所編的《沅湘通藝錄》收錄的才常文章，頗能窺見才常由中學轉而開始注重西學的脈絡。江標編《沅湘通藝錄》的目的，其序言有清楚說明：

湖南扼天下之中，南北東西，毗各行省者六。學者之所好，如百川分流，各得宗派。使者奉天子命，視學三年，歲科二試既畢，例有試牘之刻。乙酉秋冬之間，編校試者之作，不易一字，裛而刻之，得若干卷，名曰：《沅湘通藝錄》。

才常在《沅》書中有十一篇文章，全收在〈掌故〉一類中，其中卷三約佔三分之一，

⁸ 《唐才常年譜長編》，頁72-73。

⁹ 《唐才常集》，頁242，223。

¹⁰ 《唐才常年譜長編》，頁82。

卷三、卷四合計則約佔五分之一。¹¹ 十篇文章中除〈治新學先讀古子書說〉完全不涉及西學外，其餘都從西方的觀點去討論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綜合其各篇要旨，大概有以下幾端：(一)宜仿效西人變通學校的方法，派學生留學，但需要遵從若干守則(〈擬游歷例言〉)；(二)宜仿效西方之博覽會形式，設賽工藝會，使有所觀感效法，但亦有若干條例要遵守；(三)宜開中西條例館，變通各國律法之不合，著成爲例，解決法例爭端問題(〈擬開中西條例館條例〉)；(四)必須施行新法，並出洋學習俄、日，建維新之治，但新法施行不宜太驟(〈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五)要學習西人攻一藝終其身，合人人之專以強其國的做法(〈尊專〉)；(六)西人以尊新而強，中國方面要能夠做到「欲新民必新學，欲新學必新心」(〈尊新〉)；(七)國家富強之道是要像西方一樣，「以治己之私權歸之於公」(〈論公私〉)；(八)要設公法科與泰西律例之學以應付中西交涉出現的問題(〈論情法〉)；(九)要接納西人意見，開懇土地，講求教養，練兵通商以符合孟子「土地、人民、政事」爲三寶之旨(〈孟子言三寶爲當今治國要務說〉)；(十)宜仿效西人以機器興利，收富強之效(〈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2. 《湘學新報》中所見的西學

1897年4月，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及按察使黃遵憲之官方支持下，才常主持創辦《湘學新報》。其例言說明出版的目的是：「將群章甫縫掖之儒，講求中西有用諸學，爭自濯磨，以明教養，以圖富強，以存遺種，以維宙合。」再看其章程，則有七條：(一)報首隨時恭錄諭旨及新學一切章奏；(二)不談朝政，不議官常，主要言學術，分「史學」、「掌故」、「地輿」、「算學」、「商學」、「交涉」六門；(三)每學首列總說一篇，次爲答問，以疏通其義；(四)每學擇錄書目一二條，俾學者得識門徑訪購，但不列經學專門，蓋聚訟紛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說以明孔教真派，然言之未免過激，故暫闕如；(五)報末附格致淺理，以爲研求物理周知；(六)十日一冊，每冊約以三十頁爲準；(七)並刊翻譯西書之文。

可見《湘學新報》所載文章是重介紹，重說明，尤其是不談朝政，不議官常，主要言學術這幾點，更令分析文章涵義這種做法變得無意義。所以從研究才常西學知識的角度來看，有必要由其所引用的文獻來分析其西學之源，這是由於才常完全不曉得外語，亦從未離開過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西方，他的認識恐怕完全是書本知識而已。以下先列出才常在《湘學新報》所寫的文章，並在文章中找出所引書目，以見其西學之源。

史學

〈史學第一〉(簡稱史一)

第1卷，1897年4月22日

¹¹ 同上注，頁164-89。

〈史學第二〉(史二)

〈論最古各國政學興衰之理〉

第2-4卷，1897年5月2日-5月22日

〈史學第三〉(史三)

〈論各國變通政教之有無公理〉

第5-11卷，1897年5月31日-7月29日

〈史學第四〉(史四)

〈日本安政以來大事略述〉

第12-14卷，1897年8月8日-8月28日

〈史學第五〉(史五)

第15-27卷，1897年9月7日-1898年2月11日

掌故

〈掌故學一〉(掌一)

第1-3卷，1897年4月22日-5月13日

〈掌故學二〉(掌二)

第4-6卷，1897年5月22日-6月10日

交涉學

〈交涉學第一〉(交一)

第1卷，1897年4月22日

〈交涉學第二〉(交二)

第2-3卷，1897年5月2日-5月13日

〈交涉學第三〉(交三)

第4卷，1897年5月22日

附：〈通塞通論〉(通塞)

附：〈各國交涉源流考〉

〈交涉學第四〉(交四)

第8-15卷，1897年6月30日-9月7日

〈交涉學第五、六〉(交五、交六)

第16-21卷，1897年9月17日-11月5日

〈交涉學第七〉(交七)

第21-23卷，1897年11月5日-11月24日

〈交涉學第八〉(交八)

第24-25卷，1897年12月4日-12月14日

〈交涉學第九〉(交九)

第25-26卷，1897年12月14日-1898年2月1日

格致

〈格致淺理〉(格致)

第1, 3-4卷，1897年4月22日，5月13日-5月22日

〈質點配成萬物說〉(質點)

第5-7卷，1897年5月31日-6月20日

〈各國種類考〉(種類)

第15-27卷，1897年9月7日-1898年2月11日

以下按漢語拼音次序，把才常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排列，以作分析之用。

唐才常在《湘學新報》文章中引用的譯作或關於外國的著作

書名	引用文章	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
《安南紀程》	〈種類〉	1	1
《出洋瑣記》	〈交五〉	3	3
《大日本史》	〈史四〉	1	1
《大英國志》	〈史一〉 〈種類〉	1 1	2
《德國軍制述要》	〈掌二〉	1	1
《德國議院章程》	〈史三〉	1	1
《地理全志》	〈種類〉	1	1
《東方交涉記》	〈史一〉	1	1
《東華錄》	〈史一〉	1	1
《東華續錄》	〈史一〉	1	1
《俄史輯譯》	〈史一〉 〈交二〉 〈交七〉 〈種類〉	1 1 1 1	4
《法國律例》	〈交一〉	1	1
《法國志略》	〈種類〉 〈史一〉 〈史三〉	1 2 4	7
《法蘭西志》	〈種類〉	1	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書名	引用文章	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
《格物探原》	〈格致〉	2	2
《格致彙編》	〈種類〉	1	1
《各國交涉公法論》	〈史三〉	4	4
《古教彙參》	〈史二〉	4	8
	〈種類〉	4	
《光學篇》	〈格致〉	1	1
《海防臆測》	〈交一〉	1	1
《海國圖志》	〈史四〉	1	1
《華英通商事略》	〈通塞〉	1	1
《校邠廬抗議》	〈掌一〉	1	1
《救世教益》	〈史三〉	2	2
《空際格致》	〈史二〉	1	1
《列國陸軍制》	〈掌二〉	1	1
《列國歲計政要》	〈史一〉	1	3
	〈種類〉	1	
	〈交五〉	1	
《羅馬志略》	〈史一〉	1	5
	〈種類〉	4	
《米利堅志》	〈史一〉	1	1
《內科理法》	〈格致〉	1	1
《歐洲史略》	〈種類〉	11	11
《歐洲志略》	〈史一〉	1	1
《普法戰紀本末》	〈史一〉	1	2
	〈交五〉	1	
《日本地理兵要》	〈史四〉	1	1
《日本國志》	〈史一〉	1	5
	〈種類〉	1	
	〈史四〉	2	
	〈交五〉	1	
《日本史》	〈掌一〉	1	1

書名	引用文章	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
《日本圖經》	〈史四〉	1	1
《日本新政考》	〈掌一〉 〈史四〉	1 1	2
《日本雜事詩注》	〈種類〉	1	1
《三十一國志要》	〈交七〉	1	1
《三洲游記》	〈交一〉	1	1
《聲學篇》	〈格致〉	1	1
《聖武記》	〈史一〉 〈種類〉	1 2	3
《使東述略》	〈掌一〉	2	2
《四國日記》	〈史一〉 〈種類〉 〈通塞〉 〈通種〉	1 2 1 1	5
《四裔編年表》	〈史一〉 〈史三〉 〈種類〉 〈交五〉	1 2 6 1	10
《泰西採風記》	〈種類〉	1	1
《泰西新史攬要》	〈史一〉 〈史二〉 〈史三〉	1 1 3	5
《萬國公報》	〈掌一〉 〈史三〉 〈交四〉 〈交五〉 〈交七〉	1 1 1 3 2	8
《萬國公法》	〈交四〉 〈交五〉	1 1	2
《萬國近政考略》	〈種類〉	3	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書名	引用文章	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
《萬國史記》	〈史一〉	1	46
	〈史二〉	4	
	〈掌一〉	2	
	〈史三〉	5	
	〈種類〉	34	
《萬國通鑒》	〈種類〉	11	11
《西國學校》	〈掌一〉	1	1
《西學輯存》	〈史二〉	3	5
	〈史三〉	2	
《西學略述》	〈種類〉	1	1
《希臘志略》	〈史一〉	1	3
	〈種類〉	2	
《星輶指掌》	〈交四〉	3	6
	〈交五〉	3	
《英法俄德四國志略》	〈史一〉	1	2
	〈種類〉	1	
《瀛環志略》	〈種類〉	16	16
《猶太史》	〈種類〉	1	1
《原強篇》	〈種類〉	1	1
《知新報》	〈交九〉	1	1
《中東戰紀》	〈掌一〉	1	2
	〈掌二〉	1	
《中西紀事》	〈通塞〉	4	5
	〈種類〉	1	
《字林報》	〈交七〉	5	5

以上的數字，是粗略地把才常在《湘學新報》發表的文章作引用次數的統計，以見其西學之源。這種統計法在理論上當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引用的次數可能很少，但引用的內容可以很多。甚至可能完全沒有提到出處，但內容則大部分或完全出自某些著作。雖然如此，由於才常習慣在文章裏提到出處，所以這個總數達二百三十三次的引用可以相當清楚地顯示出才常由時文轉入西學時所閱讀或根據的文獻，這在某程度

上來說亦顯示出與才常同時代的人一部分可以看到、可以利用的譯作或著述。例如才常在〈史學第一〉的文章裏說：

是故讀歷代正史編年紀傳之錄，通古史也；讀國朝《東華錄》、《東華續錄》、魏默深《聖武記》諸書，通今史也；讀黃遵憲《日本國志》、王韜《法國志略》、慕維廉《大英國志》、徐景羅《俄史輯譯》、岡千仞《米利堅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國志略》，及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艾約瑟《歐洲志略》、《希臘志略》、《羅馬志略》，及林樂知、嚴良勳、李鳳苞《四裔編年表》，王韜《普法戰紀》，林樂知、瞿昂來《東方交涉記》，林樂知、鄭昌棫《列國歲計政要》，馬懇西、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攬要》，通西史也。惟是中西文字，迥然不侔，諸史多經舌人轉輒譯成，詞意繁蕪，誠所不免。是以初學多苦其聱牙，通人又鄙其委瑣，是在儒者平心靜氣，以西史之精者，與中史參互研究可耳。¹²

這就很清楚說明他在研究中西史異同方面所參考的譯作或著述，令人容易追尋到原始資料。另外，才常所用的文字亦指示文章內容的來源。例如：

（若前此弊端百出，《古教彙參》言之其詳。）
 法、意之興，由於國會（事詳丙申《萬國公報》）。
 余曩者得見侯官復〈原強篇〉（見乙未《漢報》中）。
 《萬國史記》：上古人民，自巴伯塔散之各處之時。
 《歐洲史略》謂革勒底族西徙入法。¹³

在這些指示性文字的幫助下，以上引用次數的統計亦並非毫無意義。當然，數字大小應如何解釋是很個人的事，但如果引用次數遠較其他著述為多的話，這就代表這些引用的資料在才常眼中應該是相當有用的著作。例如《萬國史記》單單在〈各國種類考〉一文中即曾引用達34次，在《湘學新報》發表文章中則高達46次，顯示出才常對該書相當熟悉，亦覺得相當有用，故引用的次數特別多。其他較多引用的譯作書籍亦可以這個角度去理解。

另一方面，以上對才常引用書目的統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汲取西學的途徑。關於這一點，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才常對於西方的認識很大部分是來自譯本。譯本常見引用的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譯的《泰西新史攬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by Robert Mackenzie 馬懇西）、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鄭昌棫合譯的《列國歲計政要》（*The Statesmen's Yearbook*）及林樂知、嚴良勳、李鳳苞合譯的《四裔編年表》（*The World's Date Book*）等等。由於才常在《湘學新

¹² 同上注，頁195。

¹³ 同上注，頁236，271，351，373，381。

報》是負責「史學」、「掌故」和「交涉」的，所以在這幾方面引用的譯本特別多。例如歷史方面有岡本監輔所譯的《萬國史記》、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所譯的《大英國志》(*History of England*)、艾約瑟(Joseph Edkins)所譯的《希臘志略》、《羅馬志略》、《歐洲志略》、王韜所譯的《法國志略》、李提摩太所譯的《三十一國志要》、徐景羅所譯的《俄史輯譯》、岡千仞所譯的《米利堅志》。地理方面有慕維廉譯的《地理全志》，外交方面有聯芳、慶常合譯的《星輶指掌》(*Guide Diplomatique*)，戰爭方面有王韜所編譯的《普法戰紀本末》和林樂知、瞿昂來合譯的《東方交涉記》(*The Eastern Question*)，法律方面有丁韞良(W.A.P. Martin)譯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

第二，才常西學的另一來源是當時在上海或其他地方出版的定期性或不定期性刊物，包括自1889年2月起復刊，並由林樂知主編、廣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st the Chinese)發行的《萬國公報》(*Chinese Globe Magazine*)、由傅蘭雅(John Fryer)主編的《格致匯編》(*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1896年6月在上海創刊、1889年8月停刊之《時務報》(*The Chinese Progress*)，以及1897年2月在澳門出版的《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

第三，才常對於外國地理、歷史、制度並無親身經驗，而主要靠其他華人的著述或親身經歷的記載來了解國外的情況。文章中常見引用的資料有魏源的《海國圖志》、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薛福成的《四國日記》、夏燮的《中西紀事》、蔡廷蘭的《安南紀程》及蔡均的《出洋瑣記》。

3. 《湘報》中所見的西學

才常西學知識的增加，直接影響其後他在湖南新政運動的工作。他在《湘學新報》所發表的文章基本上是靜態的，重介紹，重說明。但他在《湘報》所刊登的文字是動態的，重革新，重建立。所以西學在《湘報》時期是應用的，有政治效用的。

《湘報》的出現主要是配合湖南新政的推行。1898年2月杪之際，才常與譚嗣同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南學會。他們設會的目的，是要「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為了宣傳政策，就創辦了南學會的機關報《湘報》。才常在日出一張的《湘報》中共寫過十三篇文章。觀其內容，可以分為幾類，大部分是應用西學知識，以開啓民智，推動湖南新政。

(1) 去除陳見，學習西方觀念

才常在《湘報序》中明言中國較諸西方各國而言是一個極為疲憊滯拙的國家，要破二千餘年之積習，一定要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成立報館目的就是要「義求平實，力戒游談」以輔其他報刊之所不逮。其中一個值得在湖南提倡的觀念就是西方的「熱力」(見《論熱力(上)(下)》)。才常認為西方為熱力所摩，人人事國之事，所以要在湖南作為起點，推動熱力，「熱力速而漲者，其民必智，其國必新」。¹⁴

¹⁴ 同上注，頁462-65，476。

但另有幾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要掃除。其中一個是時文問題。才常在〈時文流毒中國論〉語重心長地指出時文已把中國推到塞智摧權腐心亡種亡教的地步。時文得人僅有一二。而西方學堂人才如恒河沙數，所以物競天擇，中國不廢時文，必將步越南、臺灣的後塵，為外國所吞食。另一個觀念是守舊排外，才常舉出國人十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加以辨惑（見〈辨惑（上）（下）〉），認為中國如欲圖存，應易獨而群，易私而公。而最後一個要正視的觀念是西學源出中國，《朱子語類》與西方格致之義不謀而合（見〈《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條證〉）。¹⁵

(2) 推動國策上的改變

才常在《湘報》發表的文章中有兩篇是涉及外交政策的。其中〈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一文分析列強與中國的形勢，認為外交上國人應摒棄成見，毋視甲午戰敗之辱而宜與英日聯盟，此固然與后黨親俄、故新黨親英日有關。另一篇是上書光緒帝提出三項建議：（一）改制新民以圖存於亡；（二）設學部以收學堂人才；（三）聯英日以抗俄。¹⁶ 他的建議都是在比較中西同異之後而提出的。

(3) 成立學會組織，推行新政

才常在《湘報》的大部分文章是推動在湖南成立各類機構或學會，以推行新政，包括以下幾個提議：（一）保衛局。才常認為應該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警察制度，成立保衛局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以保護「官紳士商種種利益」（見〈湖南設保衛局議〉）；（二）戒纏足會。才常力陳纏足之習乃為天下古今至為不平者，應成立戒纏足會以改變女子纏足的陋習（見〈書洪文治戒纏足說後〉）；（三）公法學會。在〈公法學會序〉一文中，才常謂創立公法學會目的是期於古今中外政法之蕃變、和戰之機宜等一一講明而切究之；（四）算學館。才常認為教育賢才應以習算學格致為主，所以建議在瀏陽設立算學館，加上其他學會及書院之成立，蔚為風氣，則「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而「算學又萌芽之萌芽」（〈瀏陽興算記〉）；（五）興亞義會。才常得悉日人相當擔憂中國之亡，對於湖南新政尤其注意，故有立興亞分會於湖南之議（〈論興亞義會〉）。¹⁷

四、結論

本文透過作品分析，研究唐才常在甲午戰爭前後對西學態度的轉變、汲取西學知識的途徑，以及西學與其政治思想的關係。「西學」其實是一個非常籠統的名詞，涉及非常龐雜的體系，並非具有一致性的實體。對於晚清知識分子來說，西學在中國國勢日下、傳統思想受到考驗之際的確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但大部分士人卻不懂外語，從未到過外

¹⁵ 同上注，頁510-15，516-28，530-37。

¹⁶ 同上注，頁486-93，494-96。

¹⁷ 同上注，頁466-70，479-83，501-5，506-10，53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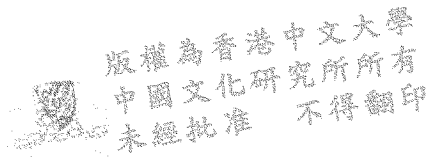
國，所以對西方的認識主要是依賴唐才常所提到的譯作或著述。而譯作的選材、翻譯的方法及翻譯的能力卻非十九世紀知識分子所能控制的。大部分西方傳教士原來的學術訓練是神學、文史、語言等非科學的科目，但到了中國後卻要在傳教之餘以科技翻譯作為與中國知識分子來往溝通的途徑。這祇是譯本方面的其中一個相當根本的問題。

不過無論懂西學與否，很多晚清士人都借重西學以建造自己的政治藍圖。唐才常的情況反映了其他知識分子的困境，也帶出了翻譯與政治發展千絲萬縷的關係。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Tang Caichang's Knowledge of the West and His Political Thought

(A Summary)

Chan Sin-wai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through a study of the life and works of Tang Caichang (1867–1900), a well-known Hunan reformer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life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ang Caicha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covers the first twenty-eight years of his life (1867–1894) in which his academic interest lies mainl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the second period runs from 1895 to 1900, in which he shifted his attention to Western learning and made enormous efforts to introduce it through various journal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to his fellow countrymen in the hope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vaders. This demonstrates very clearly a mentality that was prevalent in late Q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eager to apply Western concepts and ideas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at they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in their effort to strengthen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able to do that by acquiring some knowledge of the West through reading works translat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most of whom, however, were not trained in the ar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